

什麼是再現？跨學門觀點初探^{*}

方孝謙^{**}

《摘要》

為釐清現階段歐美學界對再現及其相關範疇的討論，俾供參加國科會整合計畫之傳播學者及一般人文社會學界人士參考，本文從定義再現為聯繫實在與意義兩個層面的象徵系統出發，就哲學、史學、民族誌討論、與傳播社會學中學者引人爭議的著作，以實在、再現、與意義之基本範疇加以組織與評析。哲學者帶給我們對再現的新認識，一方面是符號元素，或者透過彼此交換傳送相似或相反的意義；或者組合其他符號形成更高一層的意義之結構原則。另一方面是語句透過關涉說話者及其經驗世界而彰顯主觀意義的指涉原則。史學者與民族誌學者則帶給我們視雙重敘事為主要再現系統的重要性。敘事的雙重性，首先依指涉原則，牽引歷史敘事或民族誌的讀者認同所讀之物勾勒的實相；其次又依結構原則，帶領讀者進入作者與其共享的想像世界。而共享的基礎，則在不同文化獨擅之不同的喻格意識（有隱喻、轉喻、提喻、及諷喻的差別）。在澄清敘事雙重性如何具現實在、再現、與意義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以敘事框架解讀一位傳播社會學者的詮釋民族誌——製造新聞。我們發現，作者「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的

投稿日期：1999年2月11日；通過日期：1999年4月2日。

* 本文為國科會專案補助之整合型研究計畫「新聞如何再現事實：語言層面的探討」第一年子計畫（編號NSC87-2412-H-004-019-K8）之成果報告。筆者感謝總計畫主持人政大鍾蔚文教授不計門戶的邀約，以及他的再現助理群（劉慧雯、紀慧君、簡妙如、邱承君）年來安排多次聚會、討論的場地及紀錄之辛勞。更感謝朱元鴻、臧國仁、鍾蔚文諸位教授及四位匿名評論人對本文初稿鉅細靡遺的評論與建議。

** 方孝謙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E-mail:scfan@nccu.edu.tw

維持，有賴新聞工作與專業精神的運作」之主旨，乃是建立在「網」的隱喻及以部分喻示全體的提喻之上。

關鍵詞：聚合、組合、再現、指涉、喻格

符號 (sign) 對人來說，是在某些方面或性質上代表某物。符號對此人傳意，即它在此人心中創造另一相等的符號，甚至是更精密的符號。我稱所創造的符號為原初符號的「釋符」 (interpretant)，而符號所代表的某物，就稱為「物」 (object)。

——皮爾斯 (Charles Peirce)

把「再現」 (representation) 初步理解為聯繫實在 (reality) 與意義 (meaning) 兩層面的符號系統，本文希望透過跨人文社會學科的相關討論，釐清再現這個核心觀念的意涵。

上引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的一段話，提供了本文分析再現這個複雜觀念有用的理論架構。所謂的「皮爾斯三角形」，把符號——顯然指的是一種再現系統——的作用，定位在由符號，物，釋符所組成的三角關係之中。符號與物之間，就是通稱的「指涉的」 (referential) 的關係，也就是一個符號實指著客觀世界的某物。符號與釋符的關係，就是在再現系統的內部，以其他符號解釋原初符號的「釋義」過程，所以這個過程是趨向意義的定位。至於釋符與物的關係，就成為再現意義與客觀事物如何結合的問題。(1)

配合我們行文的需要，我們把「皮爾斯三角形」的關係，擴大為再現——實在——意義三端。同時我們認為，釋符與物的關係本質上是由符號與釋符的互動所決定的：客觀事物會發生「歧義」的現象，正因為符號與釋符之間，理論上可以做無止境的釋義工作 (semiosis) 所致。(2) 職是之故，我們暫把「實在——意義」的一邊擱置一旁，而把焦點放在「再現——實在」與「再現——意義」這新三角形的兩邊，用這兩軸來組織哲學、史學、人類學、與傳播社會學各學門近來有關再現的討論。(3) 從定義「再現」為聯繫實在與意義兩個層面的象徵系統出發，隨著分析的步伐，我們會逐漸擴大這個核心觀念的意涵。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從各學門中引進字面意義 (sense

)的觀念與上述指涉關係對照；引進敘事 (narrative) 作為最核心的象徵系統，一方面討論系統與實在的「對應」 (correspondence)，並在系統內討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聚合、組合原則，及此二原則與雄辯家所稱四大喻格——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的可能關係 (參見圖三)。最終，我們將得到如下對再現的了解：

再現為符號語句等象徵的集合體。它透過內外指涉對應使用它的人及其世界之外鑲意義，並以象徵本身的相似性與接近性創造其內涵意義，或云另類的實在。

壹、哲學：實在、再現、意義等範疇的澄清

哲學家有關再現的爭執自古不休，我們只能分析與再現 / 實在軸和再現 / 意義軸最相關的兩個爭議：代表維根斯坦日常語言分析學派的余羅，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健將馬庫色對「再現系統可以相對於脈絡而獨立」的異議；法國結構主義始祖索緒爾與詮釋學巨擘李克爾 (Paul Ricoeur) 對語言 (langue) 與話語 (parole) 這一對觀念的歧見。哲學家的討論，常常是規立了相當寬鬆的範疇，而讓後續的人文經驗學者能進一步做技術性的辯難。(4)

余羅在他最近的一本新書 (Searle, 1995) 中，以加重語氣重申維根斯坦學派對再現的看法。他以所謂的「外緣實在論」和「對應論」，根本取消再現 / 意義軸可以獨立存在的說法。

余羅首先說明，他的「外緣實在論」和「對應論」是神智清醒的哲學家的「基本預設」 (essential presuppositions, 1995: xiii)。外緣實在論是純形式上的一種本體論，認為「世界獨立於我們對它的再現而存在」 (p.150)，或者說「物件存在之道在邏輯上與所有人類的再現無關」 (p.155)。而對應論是包含於外緣實在論中的一種認識論，一種有關真理的意義的理論。對應論認為，再現的語句或信仰，有而且只有當它對應於實在的某方面才為真 (p.151)。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他攻擊孔恩 (Thomas Kuhn)、羅蒂 (Richard Rorty)、德悉達 (Jacques Derrida) 等社會建構論者為「反實在論」 (p.157 & p.183)。他的攻擊理由可以整理如下：

1. 「社會建構的實在，需用如下不斷反覆的邏輯形式來創造：結構 x [如這張紙] 在 c [持續的集體認可] 的情況之下，可視為 y [紙幣]。但是不斷反覆的形式一定可以刨根究底至 x 的一個元素 [如樹皮]，而該元素不是由制度所建構的。果

其不然，你會碰到無限倒退或循環的困境。」(p.191)

2. 日常所了解的有關物質性事實 (physical facts) 與制度性事實的語句，是有區別的。了解關於山 (物質性) 和紙幣 (制度性) 的語句，都需要外緣實在論的存在；但是了解紙幣的語句必須預設再現系統的存在，而了解山卻不必 (p.194)。
3. 所以，社會實在預設了再現的存在 (p.194)。而再現永遠是從某一角度出發的 (aspectual) (p.175)。簡言之，「有關紙幣的事實可以是在認識論上客觀存在的，縱然我們承認紙幣的存在是社會建構的，[而既稱社會建構就意謂] 乃在本體論上為主觀的。」(p.183)

用個比喻來說，余羅的實在論是像剝洋蔥似的，洋蔥層層的皮都是再現建構的，是主觀的。但是洋蔥的核心卻是客觀存在，而且是再現之所以可能的基石。早在余羅的著作問世前三十年，馬庫色對維根斯坦、奧斯汀 (J. L. Austin) 如上的日常語言分析已提出反駁。他的反駁意見可以問題形式出之：如果再現系統能夠建構另類的實在，則又當如何？

馬庫色首先批評日常語言分析是一種單向度的思想，一種哲學上的「運作主義」：認為哲學分析的目的，是要「讓所有事物保持原狀」(leaves everything as it is, Marcuse, 1964: 173)；進而肯定哲學觀念的有效性，來自「理論與實務、真理與事實的和諧 [即對應]。」(p.172) 他問道：「觀念 (或字詞) 的釐清，可以配合實存的 (actual) 日常論述世界，但釐清工作可能僅止於這個世界嗎？」(p.176) 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哲學家存在於一個哲學的思考與語言的世界，她的釐清工作是要「超越眼前的具體情況和對情況的表述。」(p.177) 換句話說，馬庫色不滿像奧斯汀的語言分析，只針對當下的經驗實相，而不能從超越的哲學實在出發，揭示「模塑並限制 [日常] 論述世界的具體社會過程。」(p.195)

他以奧國作家克勞斯 (Karl Kraus, 1874-1936)，用「內在的」手法分析報紙上的隻字片言作例，認為分析字句的意義，是要掌握它在多向度世界裡的發展，就如克勞斯把報紙上的字句，分析為三個相關、重疊，甚至衝突之意義系統的揭露：個體的進程 (報上文章在當下場合，為某一目的所做特定的傳播)；個體參與其中之理念、價值、目標的彙總系統；整合不同乃至衝突的個體、理念系統的特定社會 (pp.172-3)。

我們注意到，馬庫色在六〇年代所使用的語言，不脫當時美國社會分析的主要範疇：「系統」、「整合」、「衝突」。這個傾向呼應了他對日常語言分析的另一批

評：忽略時間因素，自外於社會變遷（p.198）。但同時，馬庫色是肯定「哲學思考與語言世界」的存在，也就是再現／意義軸或簡稱文本系統的實在性，並以之揭露實存的經驗世界的侷限：個體受多重意義系統的網綁而不自覺；尤有甚者，維根斯坦、奧斯汀等哲學家還要「讓所有事物保持原狀」。

憑心而論，馬庫色與前述的余羅一樣，都承認文本系統首先因為指涉經驗世界而存在。不同的是，余羅肯定了「脈絡為本，文本為次」之後，就不再考慮文本能否創造另類實在的問題。換句話說，余羅只承認經驗世界為唯一的實在。馬庫色則標舉文本中的哲學世界，作為批判實存世界的立足點。文本中的另類實在，在他看來遠比經驗世界更真。於此，我們可以下結論說，馬庫色為宣示再現／意義層面的相對自主性（因為仍然根源經驗世界，所以不是絕對自主）起了頭，但是他申述能夠自主的理由，多少是出自他對批判思想之優越性的信心，而並沒有提供文本系統能夠相對獨立於時空脈絡（context）而運作的實質理由。這一實質理由，我們必須求諸另兩位思想家，索緒爾與李克爾對語言與話語這一對觀念的分析。

索緒爾首先是一位語言學者，但就他的專業學說對二十世紀歐洲思潮的影響而言，他無疑是接近哲學家地位的思想家。他的學說中，把人類即身的傳播行為明確畫分為「語言」、「話語」兩部分，又視語言為一不受時間影響的結構，其中的組成符號依聚合（paradigmatic）關係與組合（syntagmatic）關係而固結成語言結構。⁽⁵⁾

語言指的是根植於溝通者集體記憶中的一套文法規則，先於溝通者吐音、寫字前而存在，而且「每一個說話者都不具備完全的語言，完全具備者只有群體。」（Saussure, 1959: 14, 引自Silverman, 1983: 11）另一方面溝通者吐音寫字的結果，索緒爾稱為話語，一種在具體溝通行為中對「語言」極不完美的模仿。索緒爾重視的是對完美不變的語言系統的分析。

構成語言的元素——音素、字根、同義字、反義字等符號——能夠造成話語溝通後明白對方「意思」的結果。這種達成意義的機制，來自一個元素 a 與另一元素 b 之間的聚合與組合關係。a、b 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意義的產生首先來自 a 與 b 的聚合：a b 共享同一韻腳、同一偏旁、同一字頭或字尾，或 a b 是一組同義字或反義字（同義或反義都必須指涉同一物事）；簡言之，符號元素的聚合關係表現在符號之間具有某種相似性（similarity）。落實來說，「愛」、「恨」在「我愛你」與「我恨你」的句型中，具有相同的聚合關係，因為兩個符號共享一個相似點——你的人際關係。引申來說，如果「人比黃花瘦」的意義能被接受，必定接受者從「少女（？）」與「黃花」二詞中，看出某種「纖弱」的相似性。⁽⁶⁾

再回到 a b 的組合關係。索緒爾強調，組合關係只能在實際的話語中體現（1959: 123）。a b 在一句話中占有位置，兩個位置呈現形式上的接近程度（formal proximity），就是它們表現的組合關係。正如 a b 代表「回」「家」二字，它們在一句話（譬如「我『回』到『家』了」）中相關的文法位置，就構成它們的組合關係。不同於 a b 因為有相似性而表現聚合意義，a b 與其他符號的接近程度使它們組合形成更高一級的意義，也就是「我回到家了」一句話的整體意義。⁽⁷⁾

所以在索緒爾的理論中，我們看到座落在再現 / 意義軸上的語言系統，其內部的符號元素，或者透過彼此交換傳送相似或相反的意義；或者組合其他符號形成更高一層的意義（卡勒，1993：104）。要言之，他似乎找到了兩則形式的規則，以資「證明」再現系統能不假外力，在內部繁衍意義。難怪有人盛讚依聚合與組合發展出來的語言學，以及由之擴大的「符號學」，為「文化的自主性」，提供了最堅實的基礎（Smith, 1994: 92）。但是如果仔細思考索緒爾所言，組合關係必須體現在實際的語境之中，則「語言」與「話語」的界限似乎是流動的，因為我們說不準組合意義的產生，有多少是受到語境所代表的「脈絡」的影響。也因為這樣的懷疑，李克爾試圖重新釐清語言和話語的界限。他從索緒爾的話語範疇中，開展出語意學（Semantics）——所謂「論述的語言學」的理論建構（Ricoeur, 1976: 7）。

在分析了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特徵之後，⁽⁸⁾李克爾肯定道，「語言依賴兩個不可化約的實體而存在，符號與語句（sentences）。」（Ricoeur, 1976: 6）他認可索緒爾在「語言」範疇中發展符號學的貢獻，但也認為必須在「論述」（discourse，李克爾用以稱呼「話語」之詞）的層面建構語意學。如果說符號學分析的對象是符號，那麼語意學研究的重點就是語句，以及語句結合而成的論述。

論述在溝通上的作用，是由論述事件與論述意義的交互關係而起的，而事件與意義的各個層面自身，又是內在的交互關係的結果。以論述作為事件來看，這個事件是客觀力量與主觀力量的互動結果。客觀力量指的是「語句的意義」（utterance meaning, 1976: 12），就是語句由諸如主詞＋動詞＋受詞這種文法的位格，所傳達的內容。主觀力量則指的是「話者的意義」（utterer's meaning, 1976: 19），表現在語句的自我指涉部分（self-reference，如在稱不喜之人的名字之後，以「牠」代稱）；語句的促動部分（performatives，如期許、應允、命令、問話的語句，除語意本身，都含有行動的部分）；及字裡行間話者的心意。這兩種力量運作的結果，就是孔夫子所言「聽其言而觀其行」的傳播效果。

以論述的意義來看，當然有一部分是由上述的主客觀力量所決定的。但是除此之

外，意義同時也是「字面意義」(sense)與「指涉意義」(reference)辯證的結果(1976: 20-22)。這裡的字面意義還是指的上述的語句的意義(推李克爾之意，也就是聚合、組合原則運作產生的符號意義)，但是指涉意義卻是形容語言必然連接到脈絡世界的關係。這是因為，我們人作為「指涉的本體論條件」而「把經驗帶進了語言」；即，人必先於語言而生活，而生活的經驗必反映在語言中。

總之，李克爾語意學的精義，就是在再現/實在軸上，相對於聚合組合的原則而指出語言意義的另外兩個源頭：話者的意義與來自經驗的指涉意義。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促動中以及使用中的論述，指涉內外兩層：向內直指一個發言者，向外則指著一個世界。」(1976: 22)

我們以上討論的四位哲學家的再現理論，很明顯的可以兩兩分類，分置於再現/實在軸與再現/意義軸上。座落再現/實在軸的是余羅與李克爾。前者申論人文化育的社會實在，預設再現的存在；他並批評極端社會建構論者只重再現系統所以是反實在論的。後者則願意認可語言意義的源頭，有一半來自再現系統裡的符號學原則的運作，但也強調另一半是來自實在世界：活生生的人及她的經驗，通過自我指涉與對外指涉，而賦予語言字面以外的許多意義。

座落再現/意義軸的首先是馬庫色。他宣示了再現系統雖來自經驗脈絡，卻可以相對於脈絡而自立的命題，他的理由是，批判哲學可以提供比經驗世界更理想的實在。最後是索緒爾，他以符號的相似性和接近性，真正為馬庫色的命題提供了實質理由。我們以下討論的各人文社會學門有關再現的爭議，也就如這裡的分析一樣，都分別座落在再現/實在、再現/意義軸上，當然也有橫跨二軸的。尤有甚者，在七〇年代以來的「語言學轉折」(the linguistic turn)影響之下，有更多的爭議是集中在再現/意義軸這一端。讓我們逐一分析之。

貳、史學：再現運作法則的試擬

八〇年代的英美史學，飽受後結構主義的衝擊，至九〇年代則是面對後現代主義的挑釁。如果這樣的概述無誤，它有助於理解傅柯(Michael Foucault, 1972)、懷特(Hayden White)、以及英美史學的兩本近著(詹京斯, 1996; 艾坡比等, 1995)。兩種「後學」的內涵，我們會在以下相關的討論中澄清。本節的重點，在於檢視(1)傅柯歷史論述間與單一論述內的「規則」與(2)懷特歷史敘事的故事類型與其「喻格意識」的再現理論，是否在索緒爾的聚合組合之後，提供了再現/意義軸更令人信服的

運作法則？也在檢視(3)受傅柯、懷特及後現代主義的洗禮之後，兩本史論的作者為何分以虛無主義及「務實實在論」看待歷史書寫？我們指出，有關運作法則的討論，因為寫作風格、或機械化傾向的限制，並不令人信服；而兩本史論的立場，則顯示再現與意義、再現與實在的關連以及兩軸之間的衝突問題，還是活生生烙印史家心中。

懷特（1987: 106）曾評論傅柯的寫作風格，認為這個風格是建立在「誤用喻」（catachresis）的喻格之上。先前我們曾提到，隱喻是聚合關係，也就是詞類之間相似乃至相反性的體現，而誤用喻就是專指與被喻詞（tenor）性質相反的隱喻。誠然，傅柯在執著「考古學分析」時期的語彙——論述、語句、規則、詞語表現（verbal performance）等，都令人乍看之下是李克爾、奧斯汀學說的翻版，究其實卻又都不然。於是，我們在評論他主要的再現理論，也是他唯一的方法論專書——知識的考掘（Foucault, 1972）時，⁽⁹⁾不免要相當武斷，以論述內（intradiscursive）、論述間（interdiscursive）、以及非論述（nondiscursive）的三分法來撮其要。我們嘗試證明，傅柯的論述規則創造了論述獨有的空間，繼而創造了空間中絕大部分的論述動作；換句話說，他的再現理論相當程度解構了與論述相屬的物體，主體、觀念、策略等的客觀存在。也就是說，他破壞了傳統史家堅持歷史檔案「對應」於歷史實在的信心。

傅柯承認「非論述的實踐」的存在（1972: 68 & 162），但是他的考古學方法論的焦點，卻在對論述作挖掘檔案式的描述。這裡的檔案（archive）有二層意思：首先它是「掌握語句以獨特事件的樣式出現的系統」（1972: 129），亦即決定歷史的總相中「什麼」是可以被說出來的形式規則；這些規則總稱為「歷史先驗性」（historical a priori）。其次，檔案又是「決定能說之物如何叢聚於獨特的〔四大〕樣相」的形式規則（1976: 129）；也就是四大「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的規則決定了可說的究竟「如何」被說。所以，在歷史實踐中，只有少數事物依歷史先驗規則被篩選出來，而篩選的事物又依論述形構規則呈現讀者眼前。那麼這兩類規則究竟是什麼？

依拙見，傅柯描述的三則歷史先驗規則（1972: 118-25），是述說著在再現／實在軸上，論述之間的關係。它們之間首先共享一個「稀有性」原則（rarity）：「不是所有事物都被說了出來，相對於語言元素可做無限的組合，語句（乍看無限）卻總是不足的……」（p.118）這是因為現有語句「乃事物經傳遞與保存，因此有了價值，也有人要襲為己有」的緣故（p.120）。其次，所有由語句構成的論述都共享一「外在性」原則；它們「都不指涉一思考的主體（a cogito）」，反而應視它們為「無以

名之的場域，其整體定義了發言者的可能位置。」(p.122) 傅柯的「論述」，不同於李克爾的定義，是與發言者與她的經驗世界無關的，反而是論述決定了占據特定地位的發言者。最後是「累積性」原則 (accumulation)。歷史事物經稀有性、外在性篩選剩下的斷簡殘篇，仍保留一種不斷反覆的「生存狀態」，一種由各式殘缺論述積累而成有關「熟睡、淡忘、失根」的主題 (p.123-4)。換句話說，論述之間的累積性，使麻瘋、精神病史這種社會淡忘，或不願憶起的研究，有可能存在。歷史先驗規則，顯然是處理著史家當下的所有檔案——所有既存論述——是如何在無涯無盡的事物中，被選取出來的經過。所以實質上，這三大規則也是處理著再現與 (歷史) 實在的關係。

傅柯又定義「論述形構」為「語句……離散與分配的原則」(p.107)，⁽¹⁰⁾這一原則包括了有關論述客體、主體位置、觀念、及策略的四大規則，及其衍生的罄竹難書的細則。我們認為傅柯縷述這些規則、細則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解釋，為什麼某一歷史檔案——某單一論述——在讀者面前呈現的是這般或那般的「樣相」(modality)：包括檔案本身的討論對象如何出現、如何被刻劃；書寫者的身份、寫作場址、當下情況；所用觀念之間的傳承或共存關係，觀念本身之翻譯、再定義或系統化；寫作策略如何布置論述內的衝突元素、同義元素，如何處理論述間的類比、相反、或互補關係，如何定位本論述與非論述實踐之間的關係。

如果我們對形構規則的理解無誤，那麼這些描述單一論述內部的規則，就是處理著再現系統內部語句與意義的關係。但是，就像上述所說，策略規則也涉及論述間、與非論述實踐間的關連。可見，當我們要定位傅柯是在再現 / 意義軸上進行理論工作時，他偏偏帶入再現 / 實在軸的討論；就如我們定位「外在性」原則應屬再現 / 實在範圍，他又偏偏申述此原則如何整體性的決定主體位置。懷特評論傅柯的風格為就像「誤用比喻」似的，我們深有同感。⁽¹¹⁾不過總而言之，從整個歷史先驗規則與論述形構規則來看，寫作《知識的考掘》時代的傅柯，顯然想在索緒爾、李克爾的影響之外，另闢蹊徑，白描 (pure description) 歷史的論述空間及其內部，如何獨立於非論述實踐而運作的樣相。因此我們似可結論說，傅柯的說法，相當程度破壞了傳統史家深信歷史檔案對應於歷史實在的信念。

相對於傅柯的破壞只是「相當程度」，懷特的顛覆力量有時是很極端的。譬如他說，我們希望被再現的「實在事件表現如下的生活形象：連貫、統整、圓滿、自足，但是這種生活是而且只能存在想像之中。」(White, 1987: 24) 歷史實在的任何意義，是透過史家的想像，化為筆下的歷史敘事而來。於是，敘事 (narrative) 成為懷

特建構再現理論的重點；不僅如此，史家賦予敘事的當下價值（如能呈現某種生活特質），也決定於她所處時代特有的「喻格意識」（tropic consciousness）。易言之，就懷特對再現的認識來說，歷史意義是由敘事及其背後之後設喻格所雙重決定的。

敘事的特性與我們現時對實在的看法是息息相關的。懷特說，「現代人討論歷史與小說的區別，其實預設了如下對實在的看法：只有當實在（"the real"）具備敘事性，才能被當作真理（"the true"）看待。」（1987: 6）那麼敘事如何把歷史脈絡中的事件，轉換為文本中的「真理」呢？

懷特首先界定敘事這種文體：「把有韻律並不斷重複的特點（motif）集結成主題，再把主題集結成情節結構[的文類]。」（1987: 43）這種文體透過兩種作用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第一，敘事令讀者注意文本中的表面指涉對象：脈絡中的事件、主角、機構等；接著，它吸引讀者注視深層的指涉物：「特定文化中滋長的各類故事之情節結構。」（1987: 43）而就在第二層作用中，浪漫劇、悲劇、喜劇、諷刺劇等故事類型以它們的譬喻語言（allegoresis，意謂「意在言外的說話」），間接的傳達給讀者歷史的真理，也就是各種故事曉諭的意義。於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在這雙層敘事裡，讀者為何及如何依循特定的故事（或者說戲劇）類型而掌握歷史意義？為什麼她會信以為真？

懷特並沒有從人性出發建構他的再現理論，所以他不能回答說，因為人的意識天生就會接受譬喻而自明。他轉而用四大喻詞構成的「喻格意識」及其歷史循環來說明（1978: 72-3）。首先，隱喻提供給被喻詞相似或相反的意義；而轉喻（metonymy）及提喻（synecdoche）則進一步釐清上述相似或相反的關係。以「數人頭」代替「數人數」是轉喻的說法。這個喻格以部分代全體，而強調部分（是「人頭」，意謂活人）的意義。提喻則相反，它也處理部分與全體的關係，但著重的卻是整體的意義：「索羅斯」在當前的認知下，就代表「國際炒家」。最後是諷喻（irony），懷特幾經考慮，定義為「心知肚明的誤用喻」（1987: 117）。我們曾說過，誤用喻特稱傳達相反意義的隱喻，而故意使用的誤用喻就成諷喻：當別人嘲笑使用者誤用了比喻時，使用者卻暗笑別人看不出她故意誤用。

懷特進一步引用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74）的說法，宣稱循著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的次序，我們可以掌握特定文化階段的人，理解周遭世界的關鍵：

我看到……維科的前例而堅此信念。在《新科學》書中維科提示，特定歷史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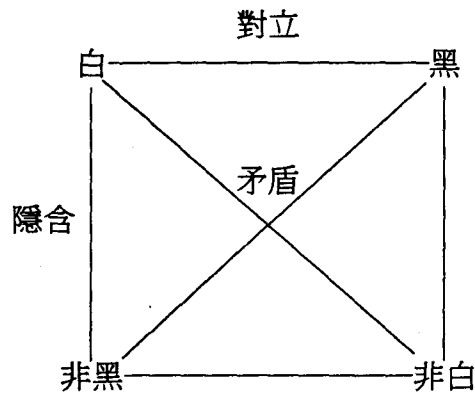
的意識形式 (forms of consciousness)，對應於語言助人理解世界而賦予的意識形式。所以文化演進的四大時代 (神祇、英雄、凡人、與衰亡時代) 中，各種科學、藝術、宗教、政治等形式，完全對應由四大喻詞——隱喻、轉喻、提喻、諷喻——依序主控的四階段意識 (1978: 80, n. 42)。

雖然引言是出現在註腳之內，懷特對時代意識由特定喻格所掌握的看法，是相當根深柢固的。以致於他在評論傅柯的成名作《古典時代瘋狂史》時，也指出傅柯從西方近代史中擷取的四段「瘋狂論述」的樣相，符合隱喻 (十六世紀)、轉喻 (十七、十八世紀)、提喻 (十九世紀)、諷喻 (二十世紀) 的四大喻格意識 (1987: 117-118)。

在懷特看來，根據四大喻格發展出來的戲劇類型依序為浪漫劇、悲劇、喜劇和諷刺劇，而戲劇類型也正是史家敘事的情節結構。所以，讀者了解歷史事實的意義，是因為她與撰史的敘事者共享了特定的情節結構，而這個結構卻是由時代的喻格意識所決定的。懷特的歷史再現理論，隱含著這樣一個命題：在世紀末的今日，用諷刺類型寫就的歷史，比其他故事類型容易說服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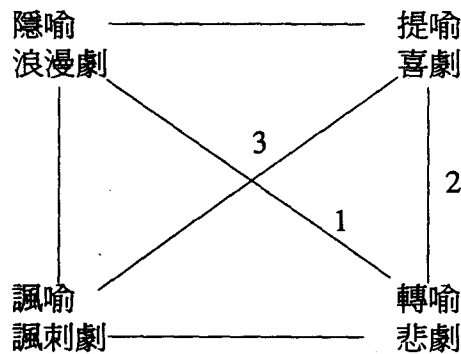
懷特對歷史再現的思考，可以說是近年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但是除了機械式的在四大喻格上加上四大故事類型，再加上四大史著 (由Michelet, Tocqueville, Ranke, Burckhardt所著, 1972: 5-20)、四大解釋類型 (表意的、機械的、有機的、和脈絡的)、四大意識型態 (無政府的、激進的、保守的、及自由的) 的排比外，他似未能賦予最基本的喻格結構，堅實的學理基礎。其實，懷特與文評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曾試圖以「符號四角形」提供這麼一個基礎，讓我們轉而評估他們的做法。根據西方中古的邏輯學者的說法，某些詞的存在，可以同時衍生三個相關的詞 (如圖一) 而構成符號四角形。在圖一這個四角形中，「白」依序因矛盾、對立、隱含關係而與「非白」、「黑」、「非黑」關連。詹明信據此就排比四大喻詞、四大故事類型如圖二，他認為隱喻與轉喻是呈矛盾關係，與提喻呈對立關係，而與諷喻呈隱含關係。但是，首先詹明信的圖示就不符懷特的原意。舉轉喻與提喻的關係來說，依符號四角形看，是隱含關係，但是懷特明言兩者是相反 (或是說對立) 的運作。其次，如果我們把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的循環以1、2、3的過程表現於圖二，也無法令人理解四角形中的邏輯關係，如何與喻格意識的輪迴掛鉤。因此，回到我們原初的架構，我們判斷懷特解消再現與實在的關連，繼而重建再現與意義聯繫的企圖雖顯得極端，究其實他的理論是架在一個預設的信念上：時代的喻格意識主宰了人們對文

本的理解。但是語言中為何在某一時代是由某一喻格當道卻不明所以。所以，懷特的再現理論，本身是一個基於信念所生的「後設敘事」。而世紀末的現在，誠如後現代主義者所言，是一切「後設敘事」消亡的時代。這種後現代的看法，也表現在其他英美史學者的文本之中。



圖一：符號四角形及其各部關係

取材：Hayden White 1987 (1982) "Getting Out of History: Jameson's Redemption of Narrative," in his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159.



圖二：喻格意識與故事類型的循環關係

取材：Fredric Jameson 1987 "Forward," in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xix.

如果把我們的三角形架構拉直，而把意義與實在分置於通過原點（再現）的水平軸之左右兩端，則上述的評論指出，傅柯的立場當在原點靠左處，而懷特則在更左的地方。受傅、懷兩位及其他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英美史家，立場則顯得頗為分歧。下面要一起討論的兩本史論中，英國作者詹京斯（1996）處於比懷特更左處，美國作者艾坡比等（1995）則反向越過原點，回到向實在趨近的位置。

乍看之下兩本英美史論的相反立場並不可解，因為兩書共享了「後設敘事消亡」的後現代論點，也贊成歷史遺跡並不等於史論的證據的分野。他們會走向意義與實在的對立面，關鍵在於，兩書作者對於語言的再現功能看法不一。

兩書作者贊成後設敘事的消亡論。在詹京斯這一方，他直接引述後現代主義者李歐塔的主張而評論道（1996: 142）：

李歐塔〔對後現代主義〕的定義，在其最根本的基礎上，形容後現代主義為……正展現「對後設敘述的懷疑」。……意謂那些賦予西方各項發展以意義的偉大結構性（形而上學的）故事，其活力已然耗盡。

妙的是，他接著以嘲諷的口吻，敘述從「很久以前」到「我們這個時代」各種獨擅其場的意識型態的崩潰，再結語道：「虛無主義目前已成爲『我們這個時代』主宰性的、基礎性的思想先決條件。」（1996: 148）所以詹京斯是以故事，而不是解釋，來曉諭讀者如何了解不同時期後設敘事的當道與消亡。

艾坡比等女性史家對後現代主義是有保留的接受。她們一方面評論該主義是「嘲諷的世界觀，甚至是絕望的世界觀」（1995: 192），一方面又宣稱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的社會史，不斷推翻近代西方史學的三大「後設敘事：科學帶來進步的英雄主義模式，美國的國家史詩故事，『現代』的概念。」（1995: 215）而引言之前她們才用了五章的篇幅，解構了所謂的三大後設敘事。她們接受後設敘事消亡的論點，似乎是無庸置疑的。

兩本史論對歷史遺跡（trace）與歷史論述的證據（evidence）的分別，立場也相同而也似乎都受到傅柯論述分析的影響。艾坡比等人認爲「史家提出的問題把過往時代的實有遺物變成了證據，因爲證據只在與某一說法產生關係時才成爲證據……」（1995: 242）而詹京斯則在評論另一史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時說道：「根據卡耳的主張，當一個遺跡被用來支持一種議論（解釋）時，它才成爲證據。……這個主張我完全同意……證據——而非遺跡——永遠是歷史學家論述的產物。」（1996: 125-6）對於源出脈絡的遺跡與由文本產生的證據，兩書的立場既然相同，那麼

爲什麼詹京斯最終是趨近於「意義」之端，而艾坡比等卻反向提倡「務實的實在論」(practical realism)？讓我們從兩本史論對再現的認知比較起。

詹京斯認爲史家的任務，除了要發掘過去發生何事，還要了解這些事爲何及如何發生，它們在過去與現在的意義爲何。所以史家撰史過程中，「事實(facts)本身從來都不真是爭論的重點，有爭論的是在建構解釋時，伴隨事實而來的分量、地位、結合和重要性之間的作用力。」(1996: 100)由事實建構成的「實在」(reality)總是令人爭論不休，因爲「世界/過去總是以故事的形態來到我們跟前，我們無法走出這些故事(敘述)去查看它們是不是對應真正的世界/過去，[即]因爲這些『總是現成』的敘述建構了『實在』。」(1996: 61)這裡出現的是強調懷特論點的聲音。而詹京斯受傅柯的影響，也明顯表現在他對實在的看法上。「實在是一種自我參照的比喻之辭，無法接近可由感官感知的世界。文字和世界，文字和物件，始終是分開的。」(1996: 95)最後，對史家所完成的解釋，詹京斯則說：「我們追捕到實在，卻發現它是一個語言學上的記號，是一個概念。」(1996: 95)

詹京斯這裡透露的虛無主義傾向，是艾坡比等人期期不以爲然的。她們的再現理論就從批判詹京斯所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知識論開始。首先，她們認爲後現代主義的語言決定論「將脈絡壓縮爲文本」(1995: 213)。「後現代主義理論否認分隔文本與脈絡(因與果)的任何可能，因此使一切社會理論上的推測都不可行了。」(1995: 210)其次，後現代主義拉倒了一切的後設敘事，但這並不意謂敘事根本上是無效的。否則後現代主義這種「新的後設敘事」如何存立？況且「既然以進步爲宗旨的後設敘事曾取代西方以基督教爲軸的後設敘事，我們相信人們可能希望研製新的後設敘事以爲未來作準備。」(1995: 218)最後，後現代主義者視主觀與客觀之二分法爲絕對主義，他們似乎沒有想到，「可能製造出以主觀思考和相對主義爲基礎的另一種絕對主義。」(1995: 227)

在上述批判的基礎上，艾坡比等提出有關再現的務實實在論：「文字的意義絕非僅是『在吾人腦中』，字義也不會緊附於外在世界的客體而將事實恆久固定。語言慣例之形成乃是因爲具有想像力和理解力的人類藉著使用語言與其思維之外的事物相回應。」(1995: 228)她們引用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的話，重申她們認爲主觀與客觀應兩分的立場：「實在論者『會區別事物的實在概念和事物本身。……以便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同一件事物；真確判斷過程中，思考的最直接目標即是實在』。」(1995: 231)

務實實在論，我們認爲，非常接近李克爾的話語語意學——人透過自我與對外指

涉而創造意義的說法。兩者都強調是人使用語言來理解外在世界；是人在說話，而不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以降，包括傅柯、懷特、詹京斯在內強弱有別的主張「話在說人」。(12)但是，正如李克爾肯定索緒爾的聚合組合原則，是語言意義的一大源頭，務實實在論者似也必須同意：可以對應客觀事物的語言本身不是全然透明的；語言內部的論述結構，如故事類型，能夠把遺跡轉變成某類取信於人的證據。

主張「話在說人」的史家中，詹京斯跟隨傅柯、懷特的腳步，卻缺乏二者處理「話」的原創能力。傅柯把西方歷史上出現的「話」以及它出現時的獨特樣相，用歷史先驗規則和論述規則來捕捉。重要的不是他的規則能否被人套用的問題，而是他論著這些規則的風格——懷特所謂「誤用喻」——本身以及他的歷史作品，傳達給讀者「原來歷史可以這樣理論性的分析」的驚訝信息。而懷特對「話」的原創能力，表現在他把故事類型、喻格意識、和可以泛稱為「時代思潮」之物匯集一堂的企圖上。但是語言中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的循環，動因何在？懷特即使徵引符號四角形也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職是之故，喻格、故事、思潮之疊羅漢似一對一的排比，也就難逃「機械化」的批評。

西方部分史學家對實在／再現／意義的反省如上。他們就如同上節的哲學家一樣，針對實在／再現軸與再現／意義軸有不同的堅持。另一方面，卻又顯示偏重再現系統的傾向。立場分殊而重視再現，這樣的趨勢同樣表現在側重民族誌書寫的人類、社會學者身上。以下我們轉而討論他們的著作。

參、民族誌：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想像敘事的場址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文化書寫》(Clifford and Marcus, 1986)，一般咸信是八〇年代以來，對人類學者思考民族誌衝擊最大的著作，也是標示另類民族誌興起的里程碑。但是本書對民族誌涉及再現／實在軸與再現／意義軸的論點，卻是在《文化書寫之後》(James et al., 1997)這本論文集(尤其是「介紹」部分)中，得到清晰的陳述。(13)我們將以二書為出發點，在定義並澄清民族誌在二十世紀的源流之後，討論二書與社會學者(如Atkinson, 1990; Van Maanen, 1995a, 1995b)共享的有關再現系統的論點。我們會發現，人類學者與部分社會學者對民族誌的想像是非常接近的：他們都重視民族誌的敘事本質及其聚合、組合的運作原則。

蘭燈書屋第二版的英語辭典，解民族誌為「人類學中，注重個別文化之科學性描寫的一支。」(Flexner, 1987: 665)這個定義可對照新民族誌大將，人類學者克利佛

(Clifford, 1986: 100) 的說法：民族誌「寫實手法如果能『使人信服』或『有深度』，那是因為這種手法就是綿延的隱喻：以[相似、相反性的]聯想添加統整的（理論的、美學的、道德的）意義的模式。」⁽¹⁴⁾二十世紀最初出現的科學民族誌，究其實是一種寫實手法（realism），而在一位社會學者看來，至少含有四大特徵：「文本吸納了作者，使其消失；捨棄文化個體成員的視野，而代之以[全稱的]『原住民的觀點』；把文化置於無時間界限之民族誌的現刻；描寫或解釋的效度幾乎完全由作者『親臨現場』的經驗（田野調查）所決定。」（Maanen, 1995: 7）

克利佛則把上述科學的民族誌稱為經驗的民族誌，並認為它盛行的時間約在二十世紀初至六〇年代（1988: 30-1）。他指出接踵而來的是以葛慈（Clifford Geertz）為代表的詮釋民族誌。以李克爾的詮釋學做基礎，這種民族誌以詮釋代替現場觀察為主要方法，即以文本的對外與自我指涉以創造意義的方法。同時，詮釋民族誌也必須在文本中建構全稱的「原住民的觀點」（1998: 39）。雖然克利佛在這裡沒有明講，我們卻可以從懷特「提喻」的理論中了解全稱建構的原因。詮釋民族誌是一種「從一粒沙看世界」的企圖，也就是從部分推測全體的文體，在解釋類型上屬於功能（或懷特所謂「有機的」）分析。不管作者是訪問了多少個原住民而形成她的整體了解，在她筆下必須捨個別原住民而用全稱建構來再現這個整體，而這也正是懷特稱為「提喻」的應用。

詮釋民族誌之後，克利佛提示兩種新民族誌的產生：對話式的及多聲式的（1988: 43-51）。對話式的民族誌強調文本是對話者（包括人類學者和她的報告人）積極參與的產物，代表他們對實在的共同看法。這種新文體看到了從前報告人以非「學術權威」之名而被排斥於文本之外，現在想導入他們，卻產生如何適度再現他們觀點的問題。同樣問題在多聲式的民族誌中，益顯嚴重，因為在這一新文體中，想容納多種對話者的聲音，乃至於他們對實在歧異的看法。那麼從誰的角度，如何表達他人的看法，再再都成為再現的大問題。

在簡述了人類學民族誌於二十世紀的流變之後，我們要轉移焦點，探討人類學者、社會學者對民族誌之再現系統的看法。兩大相關的議題馬上浮現眼前：民族誌的敘事層次與文本權威的問題。

在前引克利佛視民族誌為寫實文體的定義中，他進一步申論這種文體有兩大敘事層次。民族誌的解釋「是對異、同有意操弄的虛構，」即它包含一個描述異質的表面及解釋普同的內層，而「民族誌敘述特殊異質的背後，都預設並指向一個抽象的普同層面。」（1986: 103）索緒爾的聚合原則、李克爾的指涉原則、及懷特的雙層敘事都

在這裡得到簡潔的呈現。而社會學者也有近乎雷同的見解。

艾金生（Atkinson, 1990: 105-127）認為社會學民族誌，像早期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社會學著作，也都含有兩層的敘事成分。客觀描述的部分，是用來報告在現場觀察到的事件；即身敘事（personal narrative）則是講述民族誌作者自己探索及啓蒙的過程。多數的民族誌都混用這兩種成分，一則把事件做直線式——組合關係——的排列，再則也依聚合關係，也就是用事件「與其他敘事單位的異同關係」，來彰顯這些事件的重要性（1990: 126）。

從索緒爾的聚合、組合原則，到李克爾的自我與對外指涉、到懷特敘事的表層與深層指涉，再到克利佛、艾金生的雙重敘事結構，筆者認為，我們看到人文學者想像再現——意義——實在的一道活水源頭。以說故事這種捕捉人類經驗的再現系統做出發點，故事的語句，對外是聯接說故事人及她的世界之客觀存在物（李克爾）；語句果然可以對應外緣的實在（余羅）。敘事語句之內，艾金生純然回到索緒爾的傳統，認為語句透過組合與聚合的原則，創造內在的意義。而克利佛對敘事「表異實同」的構思，其實更近於懷特。但是，只有懷特進一步指出，敘事語句內在指向的普同基礎，就是隨著文化演進而循環的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等四大喻格。懷特雖然無法說明為何四大喻格隨文化脈絡而流轉，但他的敘事理論終究又指回到脈絡層次卻是無庸置疑的。另一方面，懷特也許會承認，這四大喻格作為符號最終是根據聚合（隱喻、諷喻）與組合（轉喻、提喻）原則的應用而得出。⁽¹⁵⁾那麼，從再現系統的內外延伸及其內部的聚合組合來看，任何討論再現的理論，似乎是無法擺脫「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的形式思考。

讓我們再回頭討論民族誌的文本權威。艾金生的著作（1990），可以說主要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發。他分民族誌的作者和她的文本兩部分來說明。

民族誌作者如何說服她的讀者相信她的知識權威？艾金生綜合其他學者的意見如下（1990: 17）：這位作者可以明白宣稱自己發言的資格（如做了多少年的田野調查）；她可以對研究材料做不斷的分類，用分類本身來宣示她因為有特別的知識，所以能夠如此分類；她也可以利用代名詞的文法分類，一方面顯示她的客觀觀察，另一方面也暗示她能神入她的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

對於代名詞在民族誌中的作用，一位人類學者（Crapanzano, 1986: 71）有很精闢的解說。「你」在民族誌中的使用，一方面是訴請讀者與作者將心比心，另一方面也是減低作者在文中咄咄逼人的色彩。同時，「你」跟「我」在文中都有指示（indexical）的作用：兩種人稱都關連到語句所從出的脈絡，通常就是田野的現場。

而「他」則指回前文出現的專有名詞；第三人稱是被文本所拘限的。我們因此可推知，所謂客觀觀察，是由第三人稱帶動的文本現象，反而將心比心的互為主體現象，是由一、二人稱指向脈絡而完成。

艾金生接著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討論文本權威的建立。他從民族誌的導論、論式（argument）、及敘事三方面來探討。

在民族誌的導論中，作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吸引讀者「簽訂」一個「敘事合同」（1990: 70），也就是建構一個讀者可以理解的框架，告訴他們作者要報告的事，發生於彼此都了解的實在之中。這個合同的建立，可以透過俚語俗話般的文章標題來完成；也可以經由作者在文章一開始的生動描寫來達到。

論式的組成元素就是範例和評論兩部分，兩者之間保持著一種異與同的聚合關係。也就是說，範例志在建立可引起共鳴的典型，用紀錄手法把「實在」呈現給讀者；評論卻是要打破共鳴，指出典型的不可解之謎，再施以作者的反思提供謎底。當然，習慣「一言堂」的讀者，可能在讀到評論處就把「合同」撕毀，拂袖而去。要言之，論式本身還是經由聚合的運作而形成克利佛所謂「綿延的隱喻」。

範例和評論的關係，艾金生告訴我們，也就是前述的客觀描述與即身敘事的聚合關係。在民族誌中，我們會發現作者不斷重複使用這兩種敘事成分之異同比較。「重複使用」在這裡是關鍵詞，因為只有透過重複使用，範例才逐漸成為評論的證據；亦即田野調查通常得到的是支離破碎的遺跡，只有把遺跡鑲嵌在不同的故事中並不斷覆述這些故事，才能在讀者心中鑄成「證據」（1990: 128）。肯定了作者本身的知識權威的讀者，在簽了「敘事合同」之後又接受各種故事中的「證據」，多方夾擊之下，她似乎只有對作者視為最重要的信息——評論——豎旗投降。

總而言之，新一代的社會科學者如艾金生、克利佛，對民族誌的文體有相當一致的看法。民族誌是以雙重敘事結構做基礎的寓言，而寓言本身及其敘事結構都依循聚合（與組合）原則來運作。用艾金生的語彙說，寓言中的範例與評論之間呈現同／異，也就是聚合關係；而在敘事結構中，克利佛再次強調異質描寫與普同關懷的聚合關係，而艾金生則補充了故事把脈絡事件做直線式排比的組合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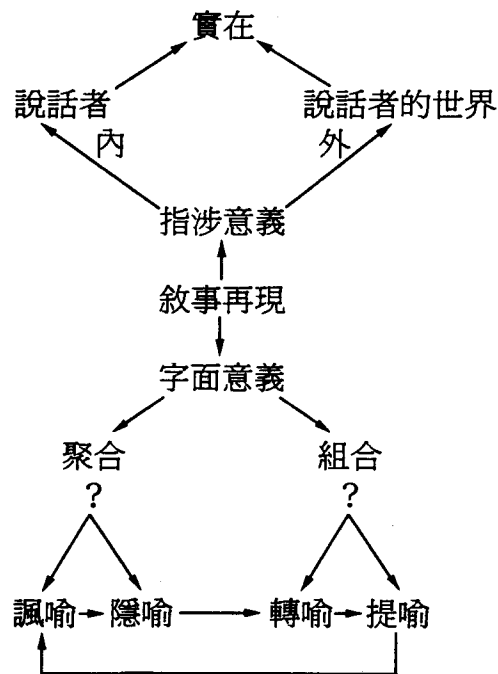
在我們最後進入傳播現象的解讀之前，我們應該利用上述多位學者討論再現的經驗，重新檢視我們用以組織本文的三大範疇：實在、再現、與意義。

對實在的看法，除了余羅的外緣實在論，堅持一個單向度的經驗世界之外，其餘作者都指出人的傳播行為創造另類實在的可能性，乃至具體的機制。但是所有提到另類實在的作者，都把它存在定位在發抒人的想像力的傳播行為——我們所謂的再現

或文本系統之中。

另類實在歸根究底，是人對經驗事件的想像而賦予意義的集大成。但是意義不是單純的對應經驗事件；如果是的話，那麼人對事件不會有歧義的了解。意義之所從出，必須附著在人所創造的象徵符號之上。是意義與符號載具之間的聯繫，使簡單的對應說出現困難。在這裡的「聯繫」，李克爾的指涉說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說明。符號載具——他稱為語句——必須指涉使用載具的人及她的經驗；她的吐音說話是可以直接對應她所要講的事，簡單的對應意義是存在的。但是，李克爾沒有輕忽語句本身的字面意義（sense）的問題，他也承認索緒爾的聚合、組合原則，即字詞以其相似相反及接近的性質創造意義的重要性。符號載具本身的特性成為創造意義的來源，這似乎是余羅所不願意承認的。

在索緒爾的聚合、組合原則與李克爾的指涉意義（reference）與字面意義的提示下，我們認為，除余羅、傅柯外的學者才能集中精神，把敘事看作最有影響力的再現系統，而鑽研它的雙重結構如何賦予經驗事件指涉與字面意義的問題。就中，懷特要把組合、聚合與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結合，再把四大喻格與文化階段結合的企圖最為壯闊。如果他能成功，那麼「喻格意識」最終又歸附到經驗界的文化演進上，彼時則又證明余羅的外緣實在論畢竟是真的（見圖三之綜合）。



圖三：實在、再現、意義關係綜述

在以上的認識基礎上，我們似可重新定義再現為，符號語句等象徵的集合體，它透過內外指涉與經驗事件對應，並以象徵本身的相似與接近性質創造另類的實在。

肆、再現傳播現象：閱讀《製造新聞》

塔曼 (Gaye Tuchman, 1978: 181) 稱她的書《製造新聞：建構實在之研究》為「新聞工作的民族誌討論」，而書中的資料，是作者經十年的時間，斷續在波士頓、⁽¹⁶⁾紐約參與觀察電視台、報社、市政府新聞室的記者作息而累積起來 (1978: 9)。另一方面，她用以說明民族誌資料的概念，則借自知識社會學的意識型態理論，及她所稱的「詮釋社會學」(即許志 (Schutz)、柏格與魯曼 (Berger and Luckmann)、葛芬柯 (Garfinkel)、及高夫曼 (Goffman) 的相關概念)。我們稱她的著作為「詮釋民族誌」，應不為過。既然此書是社會學者討論新聞工作的時空分布及專業精神的民族誌，它與我們上述的再現理論可以接軌；而且，自塔曼把工作分布與專業精神視作新聞界篩選實在的「框架」之後，傳播學者似乎未積極拓展這一研究傳統，⁽¹⁷⁾所以我們在本書出版二十年後，用實在 / 再現 / 意義的架構來展讀，也許還不失時。本節中，我們將評述塔曼這本著作，是以「網」的隱喻及以小見大的提喻構成詮釋「新聞工作者觀點」的民族誌。

從「這本民族誌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故事」之問題意識出發，我們可以權宜的用艾金生討論文本權威之導論、範例、與評論等範疇，來摘要本書的內容。在需要建立「敘事合同」——即取信於讀者——的第一章裡，塔曼首先要對章名「新聞作為框架」解題。新聞工作如何及為何變成篩選客觀世界，再現另類實在的機制？塔曼 (1978: 5) 以本書的主旨來回答：

新聞的專業精神是隨著現代傳播組織而發展的；而專業工作則為組織的需要而服務。兩者〔專業精神與專業工作〕則又依序為正當化現存建制而服務……

新聞的專業精神及工作都是配合 (美國) 新聞機構的歷史演進而發展的，就中資本主義全國市場的興起對新聞機構，以至於專業精神與工作，影響尤其大。而一旦存在，專業精神與工作卻不期然成為維持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工具。要把這樣的主旨載入「敘事合同」之中，塔曼仰賴的是她對過去十年的調查現場的介紹 (1978: 9-12)：波士頓、紐約新聞機構的定點定時的造訪；及十年間從研究生到大學教授的成長。她不但要說服讀者她曾親臨現場，而且隨著時間流逝，她愈發變成更稱職的研究

人員。塔曼在「敘事合同」中首先要建立作者的權威。

在本書的範例與評論的部分，我們則看到新聞的專業工作與專業精神，如何成為篩選用框架的組成元素，而變成正當化現存建制這種評論的「證據」。以書中的章節來說，二至八章的前半部，屬於專業工作的時空分布及專業精神的構成之範例；而八章後半至十章則是援引理論，以申辯新聞事業的本質在維護現存建制的評論。範例與評論之間，透過「證據」（所謂三種「網」）的重複使用以比較異同，則形成隱喻一般的喻格關係。另一方面，本書章節的鱗次櫛比，我們在下文主張，乃帶有提喻般的意涵，而這種以小喻大的關係正是詮釋民族誌的類型特徵。

框架的組成元素之一稱做「新聞網」——記者在消息集中之制度性場址的空間配置（1978: 23）。用行話說，就是由記者的採訪路線、辦事處、分社，總社、通訊社等組織硬體合組成的資訊關係網。正如「網」的喻意所示，新聞網過濾林林總總的社會事件，而只報導所謂讀者群有「興趣」的事件。同時網有中心、邊陲之分，愈至邊陲，記者的責任愈輕，也愈可能聘雇的只是按件計酬的特約記者。最後，塔曼提到，新聞網的功能，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而愈發強大。

另外，框架也以新聞人員的時間配置為組成要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報記者為配合各行業的上班時間，而自訂工作時間為10:00至19:00左右。這意謂著10:00前或19:00後發生的事件，很可能得不到報導，因為記者已經下班。新聞工作者為配合時間日程，因此依經驗把新聞分成五大類型（1978: 50-8）：軟性新聞（不必預定日程的事件、不急於發布、不受傳播科技影響、有助於預測未來，如名人訪談）、硬性新聞（無法或必然要預定、急於發布、有時受科技影響、有時有助於預測未來，如火災或世界金融會議）、突發新聞（無法預定、急於發布、不受科技影響、無助於預測未來，如墜機之初聞）、發展性新聞（無法預定、急於發布、受科技影響、無助於預測未來，如墜機之後續報導）、及連續新聞（事先預定、急於發布、不受科技影響、有助於預測未來，如重大議案審查）。雖然新聞人員都熟悉這些新聞類型，類型與時間的關係（即上述括號中的四項判準）卻是由塔曼尋思而成；社會學者架在記者對他們周遭世界的了解（第一度建構）上，第二度建構她的另類實在，即她的了解。而對記者而言，新聞類型的功用就像新聞網一樣，它們自動過濾掉工作時間之外或難以歸類的事件。

除了新聞網、新聞類型之外，專業精神也構成新聞框架的重要部分。記者的專業精神包括兩部分：可信的（credible）報導及報導的形式（即狹義的再現，詳下）。可信的報導指的是報上所載，都是「以專業認可的方法，解決知道些什麼及如何知道

的[問題]，從而取得的適切消息」；易言之，都是塔曼認為新聞界所定義的「事實」(facts) (1978: 82)。這個定義中，強調「事實」是與「消息來源」互相證成的：所謂可信的新聞事實，歸根究底是因為消息來源乃可信的；而消息來源可信，則因為過去她所提供的證明真是事實，或者因為有其他來源佐證她的正確性。塔曼從這裡得出「事實網」(web of facticity)的觀念，意謂：

要說明某一事實為真，〔記者〕就搜集一堆其他的事實。擺在一起，它們個別或集體的都能自我證成 (self-validating)。[即]它們因為互相指涉而構成事實網：單項事實證成全體，全體……又證成單項事實。(1978: 86)

如果塔曼能看到余羅的著作(1995: 194)，而對上述所講的事實做「物質性」與「制度性」的區分，她就會理解到報上所載，絕大部分是制度性的事實而預設了再現系統的存在。也就是說，事實網的相互指涉，自我證成幾乎都是再現內部的意義運作現象，特別是轉喻與提喻依循組合原則製造意義的過程。因此，塔曼把專業精神畫分成可信的報導(事實網)及報導的形式，是窄化了再現範圍的做法；依我們的看法，新聞專業精神要討論的重點，應該就是如上所述再現與實在、意義之間的各種關係。

關於「事實」與「消息來源」的互相證成，塔曼還有一點有趣的觀察(1978: 91-3)。愈是位高權重的來源，記者會認為她的消息愈可靠，因為她能掌握的互相指涉互相支持的「事實」愈多。其實，記者的看法已經預設了，在既存脈絡中的組織和成員因為既存所以必然正當——黑格爾所謂凡存在的必合理。這個預設是與塔曼民族誌的主旨——專業工作與精神為正當化現存建制而服務——互相輝映的。

以我們現刻對再現廣義的看法，看待二十年前塔曼處理新聞的報導形式，不免令人覺得是「虎頭蛇尾」。她一方面定義再現為「特定文化中的成員，視為有代表意義的符碼、成規、及社會範疇 (codes, conventions, and social schemata)。」(1978: 108) 甚至說，「新聞體的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因為……〔這種語言〕既框限又完成了論述 (discourse)。它既是一種知覺又指揮這種知覺；它重構了日常的世界。」順著這裡的思路，我們會期待她進入廣義再現的討論。但是另一方面，她只提示我們：在英語平面媒體的新聞「敘事」中，標題用現在式，本文用過去式；每段很短，只有一到三句；文字次序不同於口語。或者在電子媒體中，新聞片的取景角度(空間)及播映速度(時間)會傳遞不同的意義(1978: 106-18)。文化中的成規，如何具現在新聞敘事中，既框限又幫助讀者了解她的世界？這麼重要的問

題，塔曼利用知識與詮釋社會學的概念，卻只做到上述泛泛的介紹。

整體而言，新聞網、新聞類型、及事實網鼎足而立構成傳播界篩選客觀世界的框架，也成為塔曼評論新聞框架乃助人無知之意識形態的具體範例（或證據）。她引用其他學者描述新聞組織與專業人員的工作程序，說明工序中的一大特徵是：

意識形態的工序是不去理會（not to know）的一種手段：新聞網在時空中的分布以及專業精神，避免了〔記者〕去找出經驗界的某些片段（strips），並把它們做為新聞事件來傳佈。作為框架用的專業手段，把某些社會情況的分析降為標新立異的軟性新聞，又把其他分析升為美化現狀的補修工作。（底線原有，1978: 180）

新聞框架是令記者及她的報社篩選實在，繼而不理會他們所淘汰部分的意識形態。塔曼自承她這種認知，一方面得力知識社會學者對意理的討論（1978: 177-80），另一方面也獲得詮釋社會學者的啟發。當然，對高夫曼的「框架」和實在的「片段」，或者柏格與魯曼討論既存制度如何「客體化」，或云正當化，社會意義等等概念，我們不會感到陌生。攸關我們對再現的理解的，卻是塔曼討論許志的「自然態度」與他的學生葛芬柯的「反身性」與「指向性」的關係。

塔曼定義自然態度為「接受社會現象的客觀存在之認知風格。」（1978: 186）這種態度的特徵，一在把社會生活的基本要素，如時間、互為主體性，視為理所當然；二在有這種態度的社會行動者，仍自認以極清醒的態勢面對社會生活。易言之，她的清醒適足以令她對生活要素視而不見。在這種態度之下，葛芬柯指出社會行動者以兩種方法來理解日常生活的世界。反身性方法，令行動者使用隱含（embedded）在實在裡的理由（accounts），反過來對這個實在加以紀錄、組織，或指出它的特徵；指向性方法則是當行動者「在使用理由（名詞、話語、或故事）時，〔她〕會在這些理由所從出的脈絡之外，為這些理由另填新義。」（1978: 189）總之，新聞框架篩選實在的作用，在這一路理論看來不過是反映並制度化了社會人的自然態度；這種態度一方面對許多社會生活所以可能的要素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又會以來自社會生活的客觀理由，加上她對這些理由主觀的別解來了解她的社會。

塔曼筆下的葛芬柯，就跟她自己一樣，已經走到我們所謂廣義的再現領域的城外，卻不得其門而入。乍看之下，葛芬柯的反身性與指向性，與李克爾的字面與指涉意義有雷同之處，兩者都是在處理人如何理解外在世界的意義問題；兩者都看到意義與理由（即「名詞、話語、或故事」）的重要關係；甚至李克爾與葛芬柯的老師許

志，也都私淑胡塞爾的現象學（這是為什麼李克爾與許志的理論，牽涉許多時間的討論之原因）。但是兩者絕大不同的地方，就在李克爾極早就與（以空間為主要意念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及受其影響的「後學」對話，所以在重視語句的意義由說話者的自我與對外指涉而生之餘，李克爾可以接受語句的字面意義，確由符號的聚合與組合而來。反觀葛芬柯，貴為詮釋社會學中「俗民方法論」的祖師，卻未能及早與歐陸的文化流派對話，他對社會意義的詮釋，自然也就「過其門而不入」了。

在我們利用了文本權威的範疇，與塔曼的民族誌敘事討價還價（*bargaining of meaning*），而再現了如上的故事（我們的版本）之後，我們要回溯原初的問題意識，再次追問這本民族誌說了什麼樣的故事？我們認為它的文本（或字面）意義有二：從它的主旨來說，它以社會現狀的維持，有賴新聞工序與專業精神的運作，這是由於「網」這個隱喻帶動相似意義聯想的結果；而從本書章節排比的接近性來說，它還要代表新聞界進一步做以小觀大的提喻般的宣稱：新聞機構正當化現存建制的的作用，不但發揮在波士頓、紐約，也發揮在全美乃至一切資本化、民主化的社會。這兩種文本意義是如何產生的呢？

我們首先回想懷特對上述喻格的說明：隱喻提供給被喻詞相似或相反的意義；轉喻與提喻則進一步釐清這裡相似或相反的關係：轉喻以小代大，而強調小的部分；提喻以小見大，卻強調大的部分。就隱喻而言，塔曼的故事中範例與評論所呈現的，是「網」的過濾與意識形態不理會某些實在之片段的相似關係。我們注意到，塔曼所取意理的理論，不是曼罕（*Karl Mannheim*）所謂當代意理，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也不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稱，意理再現了個體與她真實生活情況的想像關係。她取的是「辭典」：一位史密斯（*Dorothy E. Smith*）所說的，意理乃含有特定利益之不去理會的手段（1978: 179-80）。這樣的意理所遺漏的現實部分，不是跟「網」所篩選淘汰的部分有若合符節的指涉嗎？

「網」的譬喻，是橫跨塔曼的三種範例中，最鮮明的中心意象。新聞網（*net*）事實網（*web*）中用同一隱喻，已經昭然若揭；它們都喻示記者所用二網，讓許多潛在的新聞與事實堂皇從網目穿過，變成不必理會的殘餘。那麼，為何說新聞類型也是「網」的一種延伸比喻？因為不管是塔曼本身或是她訪問的新聞工作者，他們都沒有宣稱五大類型互斥而完全的（*exclusive and exhaustive*）網羅了所有的新聞品種。職是之故，類型所捕捉到的新聞，扣除因為版面限制丟到字紙簍的，恐怕遠比遺漏的所謂「不重要」的新聞要少得多。所以說，塔曼民族誌的主旨，是建立在「三網」的範例與意理的評論接榫的相似關係之上。

我們曾說，塔曼的著作是詮釋民族誌。雖然她的詮釋觀點，不是像葛慈一樣出自李克爾的指涉理論，塔曼卻與葛慈一樣，共享在文本中建構全稱的「原住民觀點」的企圖。易言之，塔曼雖是在波士頓、紐約做參與觀察，她卻想擴大她的研究成果，「至少」能應用於解釋全美國新聞媒體的現狀。何以見得？就在她討論完三網的範例，並以之對女性運動的報導做分析之後的第八章，她先承認田野調查的資料本身，「不容做歷史性或跨文化的概推。」（1978: 157）但接著她就大幅引述兩本討論美國新聞史的著作，以歷史「證據」證明美國新聞界從來就是正當化既存建制的。同時，她在做這樣全稱的概推時，已預料到個別的記者或新聞機構會反對（1978: 157-8），但是她以無所不能的詮釋者立場，就能證明記者在對他的周遭之一度建構的了解中，必然受到使用三網的蒙蔽。記者真正的作為——他們真正的觀點——只有在塔曼二度建構的理解中才能披露；而這就是她「維護現狀」的主旨。所以我們說，她的民族誌是以小喻大的揭示了當代美個新聞事業的「原住民觀點」。

伍、討論與結語

在解讀塔曼的《製造新聞》之前，我們曾涉足不同的學門以討論實在——再現——意義的架構，即討論我們的理論之「網」（見圖三）。在駐足傅柯的再現理論之後，我們接受了稱他的風格為「誤用喻」——與被喻詞意義相反的隱喻——的判準，而讓論述的先驗與形構規則，消失於網目之外。我們一方面感覺，他的再現規則乃圖三架構所從出的「二元對立」形式的破格：打破了內外指涉、表裡敘事，組合聚合的分隔界限。但是另一方面，在分析了塔曼「網」的隱喻之後，又不禁狐疑三種傳播之網，能否說是以傅柯的再現規則為機制，做特定之篩選實在的工作？易言之，傅柯所說是否能幫助塔曼進一步分析新聞所呈現的「樣相」？

舉例而言，傅柯先驗規則之一的外在性強調論述的整體定義了發言者的可能位置；而他的形構規則又強調從身份、場址、當下情況分析主體位置的重要性。這似乎指出，一個記者所報導的消息，是與她的報社內部的新聞傳統息息相關；而報社的傳統或立場又是回應整個社會演變的結果。我們不是想製造傳播學研究上「新聞室控制」與「媒體政經學」分析層次的混亂，但是，如果塔曼想從廣義的再現觀點，支持她新聞專業維護既存建制的主旨，則傅柯宣示的規則似乎是可取的進徑，又何況學者如臧國仁（1998），也已經著手在做擴大框架與再現對話的工作。當然記者的日常報導，如何與報社的論述整體接軌？她的社會化過程如何再現於新聞稿中？這種種研究

精緻化 (specification) 的工作，都超乎傅柯的想像範圍，而考驗著心懷此種研究企圖的學者。

其次在圖三中，還有兩個問號令我們感覺意猶未盡，必須在這裡做進一步的討論。我們清楚的察覺，在懷特的理論中，組合及聚合的結構原則，與隱、轉、提、諷四大喻格之間的關係並不明確。而要提高此中的明確程度，我們已檢討過，「符號四角形」——隱喻依矛盾、對立、隱含的邏輯關係生出其他喻格——的嘗試已然失敗。剩下的只有雅各遜隱喻基於聚合、轉喻基於組合的理論，以及懷特 (1987: 115-6) 所提十八世紀以來歐洲雄辯家的著作可供諮詢，而這應該是另外一篇論文的題目。但是，看到社會學功能主義巨擘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處理AGIL模式的簡潔、合理，⁽¹⁸⁾我們仍然認為釐清結構與喻格的關係，對於提高圖三架構的嚴謹程度，應有莫大助益。

總之，圖三的再現架構，提供了此刻我們認為最合用的再現定義：

再現為符號語句等象徵的集合體。它透過內外指涉對應使用它的人及其世界之外鑲意義，並以象徵本身的相似性與接近性創造其內涵意義，或云另類的實在。

這樣的定義，與其說是要提供研究者精確、可運作化的概念，無寧說是以若干學門產生的較引人注目的著作為對象，嘗試畫定討論再現的範圍；也就是企圖對再現現象的再現。儘管，我們還試著把再現架構「用」於閱讀傳播現象的再現，小文真正的期望，卻在能夠清楚的呈現再現的範圍及其相關範疇，以供後來者的對照與批判。

註 釋

- (1) 選定這一架構與在下一節選「語言行動」(speech act) 哲學家余羅 (John R. Searle) 的理論做探討的出發點，其實隱含了筆者與皮爾斯、余羅共享的一個預設：語言符號必須與人的五官所感知的經驗世界有一定的對應關係。這說來是「常識」，卻是結構主義以降各種「後學」所要積極顛覆的。下文可顯示，筆者對結構主義以及各種後學有非常同情的了解，但在本文所討論的幾位後學學者身上，我們也會查覺他們的理論背後，與上述預設有若即若離的關係。對此預設無疑的存在更博學、更抽象的形上討論，但限於筆者的學養以及我們對各種再現理論如何關照經驗研究的興趣，我們仍以此預設為我們行文的基本立場。
- (2) 從符號的層次如何跳躍到由語句構成的文本的層次？簡單的講，這是筆者隱喻思

考 (metaphorical reasoning) 的權宜措施，也就是在本質迥異的兩類事物之中，看出某種相似性思維的運用；比較複雜的答案，請看下文李克爾對符號與語句的討論。符號與釋符在外觀上是無從辨識的，它們都是符號。皮爾斯所做的區別，其實正符合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德悉達 (Jacques Derrida, 1988: 6) 所稱，自啟蒙時代以來對符號的普遍看法：「〔視〕符號為意念 (idea) 的再現，而意念為感知之物 (object) 的再現。」

- (3) 爲了行文的方便，有時候我們也會把再現 / 實在軸和文本 (或文本系統, text) , 再現 / 意義軸和脈絡 (context) 交替使用。其他各學門的作者也有不少類似的兩元分法：論述的 (discursive) / 非論述的 (non-discursive) 、紀年的 (chronological) / 敘事的 (narrative) 、乃至歷史 (history) / 過去 (past) 、或證據 (evidence) / 遺跡 (trace) 。這種視象徵層面能與實在層面匹敵的二元分法，大概是八〇年代以來人文社會思潮的最具體特徵，也使得我們在世紀末探討爲何再現 / 意義層面理論大增的問題，別有一番緊迫性。
- (4) 筆者此處討論對象的選擇，是受到非議最多的地方。朱元鴻教授在公開的評論中，「義憤填膺」的主張，選德悉達或羅蒂 (Richard Rorty) 要比選余羅做討論的起點 (point of departure) ，合適的多。兩位匿名的評論人，一位主張以李克爾，另一位主張以後期的傅柯做爲討論的起點。足見對不同哲學家的「再現」路數，見仁見智各有偏愛。筆者只想重申：(一) 小文正是想「拋磚引玉」，引出有興趣的學者，就其認爲更好的再現理論，撰文加強學界對再現的討論；(二) 筆者並不會輕易放棄「符號對應實在」的預設，理由除了註釋1所申論之外，我們必須加上學界所慣稱的「經驗研究」，已然包含此一預設的事實。除非我們一己的研究不再與學門的傳統對話，否則了解一己與傳統共享的研究預設，就是必須的。
- (5) 聚合關係索緒爾曾稱之爲 associative relations (Saussure, 1959: 125-7) 。
- (6) 本例涉及一種特殊喻詞——隱喻 (metaphor) ——的使用。隱喻爲聚合關係的體現，換句話說，成功的隱喻必然傳達給讀者喻詞 (vehicle, 如「黃花」) 與被喻詞 (tenor, 如「人」) 之間鮮明的相似關係。在本例中這個相似關係就是「纖弱」，這也就是此處隱喻的意義。
- (7) 本例涉及另一種特殊喻詞——轉喻 (mytonymy) ——的使用。轉喻爲組合關係的體現，使用轉喻是要傳達喻詞 (如「白宮」) 與被喻詞 (如「美國總統」) 之間部分與全體的關係。但是轉喻與同樣表達部分與全體關係的提喻 (synec-

doche) 不同；轉喻強調關係中的「部分」，即總統本人，而提喻則強調關係中的「全體」，即美國的總統制度。此中相關的問題，我們留待介紹歷史學者懷特的再現理論時，再進一步討論。

- (8) 結構語言學的四大特徵為：①重視同時性分析勝於貫時性分析，因為系統比變遷容易捉摸。②適用結構分析的範例，乃由可清楚劃分的元素所組成的有限集合。③在此系統中的元素本身不具意義，它所具有的是與其他元素的差別。④在此系統中，所有的關係都是內生的，換句話說，語言系統是不假外求的；「話語」的範疇沒有存在的必要。(Ricoeur, 1976: 5-6)
- (9) 有王德威(台北：麥田，1993)譯本。以下引文，則出自筆者對傅柯著作英譯本的中譯。據筆者所知，本書是傅柯唯一成書的方法論著作，對其所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有系統性的陳述，這比起他對系譜學方法一鱗半爪式的討論，適合本文的分析。所謂「系譜學方法一鱗半爪式的討論」，筆者是指傅柯在「性史」第一冊中，對現代性學之「論述整體」("economy" of discourses)的討論，已經預設了讀者必須熟悉他在「知識考古學」中的系統性陳述。譬如，他說：「性學『自然的』遭定義如下：一個病理過程的所在(domain)……；一個需要破解意義的處所(field)；一個由具體機制隱匿[權力]過程的場合(site)；一個由無限的因果關係匯成的焦點(focus)；一個需要探索和傾聽的模糊話語(parole)。」(1980: 68)而傅柯對這些所在、處所、場合、焦點、話語的看法，都在「知識考古學」中有系統的鋪陳。再如，他在「性史」中談到系譜學方法的規則之一——「論述在戰術上的多元價值」時又說，論述的世界應視為「可在各種大戰略中運作的由論述元素組成的複合體。我們要重建的，就是這個[複合體在戰略中的]分布，也就是重建分布中被說出及遭到隱匿的事…；重建誰在說、以什麼權力說、在什麼制度脈絡下說、以及各種說的效果；最後要重建針對相反目的而交替使用的相同公式〔即論述元素組成的複合體〕是什麼。」(1980: 100)引言之後，就是傅柯對論述與權力關係的討論，而對權力關係的明確討論，也可以說是系譜學勝出考古學的特點。但是此處對論述的觀點，仍然是建立在「知識考古學」中。既然本文的主要重點是「再現——意義」的討論，傅柯的「知識考古學」顯然比其系譜學更具澄清論點的急迫性。
- (10) 語句則定義為「一群符號(signs)的存在樣相」(p.107)。
- (11) 評論者常引傅柯的這句話以自嘲：「我不在你躺著等我的地方，我在這裡，嘲笑著你。」(1972: 17)

- (12) 結構主義人類學者李維史陀曾留下這樣的談片：「雖然我所要講的是我過去所寫的，……我卻不會有我寫下我的書的感覺。我倒是感覺我的書經過我而寫出來，而一旦經過了我，我則感覺空虛、一無所有。」（Levi-Strauss 1978: 3）
- (13) 從很多跡象來看，Paul Rabinow（1986: 256-8）在《文化書寫》發表的文章，都是後來形成《文化書寫之後》論點的先驅。二書共享的討論範疇為真理、主體、權力及再現。但兩書也有一點根本相異處，這見諸於《文化書寫之後》所宣示的立場：相對於《文化書寫》的論文集集中在「文本作為建構〔民族誌〕權威的場址」，本書卻著重「民族誌獲得權威的社會過程。」（James et al. 1997: 14）
- (14) 注意克利佛對隱喻的解釋，與索緒爾、懷特一致。
- (15) 懷特（1987: 223, n. 36）已注意到蘇聯結構主義語言學者雅各遜（Roman Jakobson）有關隱喻與聚合，轉喻與組合關係的理論。但是他卻沒有積極以雅各遜的理路嘗試以組合聚合作為四大喻格的基礎，反而，他是以不成功的「符號四角形」的邏輯關係來說明四大喻格。
- (16) 塔曼在書中把波士頓取名為沿海市（Seaboard City，似乎故意把seaboard拼成seabord），不過從其他來源可知她在猶太人創建的Brandies University（位於波士頓郊區）攻讀學位時，就定時課後到當地的報社、電視台做研究，見Reinhartz（1995），尤其是作者對塔曼的採訪（pp.273-321）。
- (17) 此乃筆者與新聞學者臧國仁教授的交談印象。當然臧教授與鍾蔚文教授等人合作的新聞框架之研究，已經接繼並發揚了塔曼的研究路線。總之，筆者不是傳播學者，對新聞框架的文獻不熟的情況下，我接受與臧教授交談印象的「票面價值」，以塔曼這本自付比較有把握的著作做為文本來分析。至於分析的好壞，則「文責自負」，全然與臧教授無關。
- (18) 帕森斯的AGIL模式，是對小至生物有機體，大至世界文明的系統性想像。他認為，任何這樣一個系統的存續，都必須滿足適應（adaptation）、目標完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完形維護（latency，或pattern-maintenance）的基本功能。以社會系統而言，它分化出經濟部門處理人群與外在自然環境的交換關係，屆以滿足社會的適應需要；同理，有政治部門以權力分配滿足完成社會目標的需要；有〔公民〕社會部門滿足全體的整合需要；也有文化部門滿足世代交替的傳承需要。而四大需要或功能的產生，卻是社會這個有機體自行運作的結果：社會面對內部與外部的環境，同時它的行動預設手段與目的兩個範疇，環境的垂直軸（由下而上分內外）與行動的水平軸（由左右分手段與

目的)交叉結果就產生AGIL四個象限；即外部環境與手段交接而生適應的需要；外部環境與目的交接而生社會目標的需要；內部環境與目的交接而生整合的需要；內部環境與手段交接而生文化傳承的需要。帕森斯的晚期弟子Edward O. Laumann因此認為帕森斯繁複的社會理論，其實是由有機體與環境互動這個簡單的中心意像出發的（筆者課堂請益心得）。

參考書目

- 朱元鴻 (1997) : 〈背叛 / 洩密 / 出賣 : 論民族誌的冥界〉。台北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6 : 29-65。
- 臧國仁 (1998) : 〈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 : 新聞框架理論的觀點〉。宣讀於「中華傳播學會九八年年會」, 台北 : 深坑世新會館, 1998年6月30日。
- Joyce Appleby et al. (1994 [1996]) : 《歷史的真相》, 薛絢譯。台北 : 正中。
- Jonathan Culler (1984 [1993]) : 《索緒爾》, 張景智譯。台北 : 桂冠。
- Keith Jenkins (1991 [1996]) : 《歷史的再思考》, 賈士蘅譯。台北 : 麥田。
- Atkinson, Paul.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 Clifford, James.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apanzano, Vincent. (1986). "Herme's Dilemma: The Masking of Subv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51-7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86). "Signature Event Context," in his Limited Inc, 1-23.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orma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Flexner, Stuart Berg ed. (1986).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n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oucault, Michel. (1969,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 Language. A. M. Sheridan Smith tr., New York: Pantheon.
- . (1976,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Robert Hurley t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Levi-Strauss, Claude. (1979). Myth and Meaning.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James, Allison et al. eds. (1997). After Writing Cul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 Jameson, Fredric. (1986). "Forward," in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vi-xxi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oopes, James ed. (1990).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Rabinow, Paul.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234-2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einharz, Shulamit. (1995).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Brandeis University Graduate Program in Sociology: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in Gary Alan Fine ed., A Second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 273-32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coeur, Paul. (1976).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 Rosaldo, Renato. (1986). "From the Door of His Tent: The Fieldworker and the Inquisitor,"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77-9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arle, John 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 Silverman, Kaja. (1983). The Subject of Semio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Philip. (1994). "The Semiotic Foundations of Media Narratives: Saddam and Nasser in the American Mass Media,"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 (1 & 2): 89-118.
- Tuchman, Gaye. (1976).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Van Maanen, John ed. (1995).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Sage.
- White, Hayden. (1972). "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Cleo 1(2):5-20.
- . (1972).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1987).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hat Is "Represent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earch For Its Definition

Shiaw-Chian Fong *

ABSTRACT

To help clarify the meaning and 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 for interested social scientists and, specifically, th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who have joined an integrated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OC, we begin by defining the word as a symbolic system connecting both reality and meaning. We then use re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meaning as basic categories by means of which we organize and critique relevant recent discussions from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forum on ethnography, and 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 Philosophers bring to us, on the one hand,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 that words create objective meaning by the nature of both their similarity and proximity, and on the other, the reference principle that by referring internally to a speaker and externally to the speaker's world, sentences convey her subjective meaning. Based on the two principles, historians and ethnographers further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 dual narrative as 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Narrative's duality manifests first in referring its readers to the empirical world that its author describes according to the reference principle and second in sharing the readers with the imaginary world

* Shiaw-Chian Fo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t Taipei. His special interests are in development and sociology of culture.

that the author create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 Here, in Hayden White's view, the shared imaginary world is based on one of the four overarching tropic consciousnesses (metaphoric, metonymic, synecdochic, and ironic) that capture the essence of a specific culture. After clarifying how the dual narrative concretiz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re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meaning, we apply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to the reading of an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sociologist Gaye Tuchman's Making News. We find that her thesis, that newswork and press professionalism legitimize the status quo, is actually born out by two tropes: a metaphor of "net," as in her use of the news net and the web of facticity, and a synecdoche that constitutes her ethnography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press' point of view."

Keywords: Paradigm, Representation, Reference, Syntagm, Trope.